



周恩来过春节

□ 李庆刚



周恩来过春节，虽已成为久远的历史，但它讲述了温暖和自豪的故事，留下了光荣而不朽的传奇，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

砥砺前行的修炼关

本是欢欢乐乐万家团圆的春节，在旧中国却被穷苦百姓称为“年关”。“年关”难过，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喜儿父女的悲剧就是旧中国穷人家庭过年的缩影。周恩来虽不是在贫苦家庭出生，但他出生后不久，家道便开始没落，母亲早亡，父亲经常外出谋生，周恩来10岁开始当家，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生活。过春节，对于周恩来来说也如过“年关”。

1910年，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淮安到东北求学，后进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离家千里，少年周恩来饱尝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1916年学校放寒假，周恩来无法回老家过年，1月31日至2月2日赶在春节前，他为新剧《仇大娘》撰写了剧本，并亲自送到商务印书馆天津印刷局赶排。忙完之后，2月2日除夕，载载子立的周恩来倍感孤独，为转移注意力，他“取校

中自治励学会新出版之杂志阅之，历三时许，全书几尽”，怀乡思亲之情又涌上心头：“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读蓼莪之章，便已感慨无垠。矧兹今夕，尤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泪盈枕席夜不寐，于今读来仍辛酸。此时此刻的周恩来多么需要亲情的慰藉！在离家求学期间，周恩来把对家乡亲人的浓烈思念之情，转化成默默为公众服务的行为——“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毕业时，同学们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周恩来在学生时期培养形成的急公好义、克己奉公的奉献精神，注定了他一生风雨却始终割不断自己和朋友、社会、事业、使命千丝万缕的情愫。

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遂密群科济世穷”。抵日不久，便传来叔父去世的消息。逝者已矣，生者如斯。1918年2月10日是除夕，周恩来约朋友座谈聊天。他写道：“一来是为着免独居起思乡之念，二来是乘着这个机会，知交的团聚团聚。”好友三人一直聊到凌晨3点才入睡。第二天春节，几个朋友“自炊饭食，甚欢”。当天，周恩来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家中有一句俗语：‘大年初一不高兴，一年晦气’”，“现在又是大年初一了”，“守着家规暂把那不高兴的事情不去想他”。他在日记中立下志向：“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年关”的考验没有击倒周恩来，反而使他历经磨难修炼成熟起来。1918年2月15日

（农历正月初五），周恩来写下两句诗：“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留法勤工俭学期间，1921年2月8日春节这一天，周恩来专门写信资助自己留学的南开校董严修“遥念福体安祥，精神爽健”。1923年2月17日大年初二，刚过完春节的周恩来出席在巴黎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作为“旅欧支部”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几番寒暑，淬炼洗礼；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周恩来开始由一个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逐渐成长为一个日益成熟的职业革命家。

奋斗不止的新战场

为了使亿万中国人民过上团圆幸福的春节，革命战争年代，春节成为周恩来奋斗的新战场。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开始谈判。1937年2月10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周恩来来到古城西安，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张冲进行了初步接触。2月11日春节这一天，周恩来同张冲、顾祝同等正式谈判。经过几次会谈，国共两党最终达成合作共同抗日的目标。

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开启后，周恩来承担的任务更加繁重。1939年春节前后，受党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1939年2月15日，周恩来与叶挺一起从重庆乘机抵达桂林。2月16日，周恩来驱车前往市郊，向八路军办事处机关工作人员和文化界党员共200多人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号召党员认真负责

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树立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2月18日，正是农历除夕，周恩来同叶挺等离开桂林赴江西；19日春节这一天，戎马倥偬、行色匆匆的周恩来现身吉安。随后，周恩来由赣东北奔赴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抗战时期，周恩来常驻重庆，对各民主党派人士做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他曾亲自出面，帮助陶行知先生将育才学校迁至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附近，以保护育才师生的安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节，周恩来特邀育才学校师生到八路军办事处一起过春节。联欢会上，周恩来希望育才学校师生“要像陶行知先生号召的那样，向人民学习，为大众谋福利”。并指出：“我们现在正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准备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我们中共代表团准备提议，由你们的校长陶行知先生担任民主政府的教育部长，你们赞成不赞成呀？”话音刚落，场上顿时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为了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和邓颖超自结合后总是聚少离多，即便是春节这一天两人也常常不得相聚。1948年春节前后，周恩来转战陕北，邓颖超则在河北阜平参加土改工作。其间，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一方面嘘寒问暖，另一方面听取他对于土改相关问题的意见。接信后，周恩来两次给邓颖超回信，其中的一次就在2月9日除夕这一天。在信中，周恩来除了表达思念殷殷的深情之外，用很大的篇幅，帮助邓颖超分析如何理解党的土地政策，直至如何具体做好工作。最后，周恩来对邓颖超遥祝“年好！”。这对革命伴侣就这样

在相互支持、相互遥祝中度过一个充实的春节。

奔波忙碌的新征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主管外交。春节前后，他常常奔波于五湖四海，广交朋友，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随后，周恩来也奔赴莫斯科，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于1950年2月14日同苏联方面共同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月16日除夕，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参加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盛大宴会；2月17日春节这一天，周恩来起草和毛泽东联名致刘少奇的电报，就土地改革有关问题作出答复。晚上6点，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并为留学生题词：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当晚，周恩来同毛泽东登上专列回国，进入国境时已是10天后的2月26日即正月初十了。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亚非欧14国，其间恰逢春节。根据党中央建议，周恩来率代表团回到昆明，节后继续访问。在成都期间，周恩来和陈毅等人参观杜甫草堂，他亲自查点人数，要警卫员统一买票入园。2月13日春节这一天，周恩来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明日即将首途续访亚洲三国，3月1日回国，经大家商定，拟仍来成都小憩，并写成（出访亚、非、欧14国）报告提纲。”1964年2月14日，大年初二，应缅甸奈温主席的邀请，周恩来访问缅甸。周恩来和奈温已经是老朋友了，4年前1960年，仍然是春节期间，奈温来华

商讨两国边界问题。1月27日，正值中国农历除夕，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在帅府园全聚德烤鸭店宴请奈温一行。1月28日春节，周恩来与奈温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上签字，中缅边界问题得到友好解决。时过4年，这次周恩来春节期间的访缅也获得圆满成功。

春节还是周恩来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时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恩来多次参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举行的春节团拜会。第一次是1954年的除夕，团拜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到后台慰问，和在场的演员开起了座谈会，内容包括北京人艺的方方面面。如男女演员的比例失调问题、工资及住房问题，甚至还有剧场有多少座位、一场演出能卖多少钱、演出收入怎么分配，等等。

每年春节，周恩来因忙于公务国事，很少有闲暇时间，但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尽量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及亲属都叫来，和大家一起吃团圆饭。1961年周恩来的侄子周保章唯一一次获准进京和周恩来过年，他记得很清楚：大年三十，周恩来把在京的亲属、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都请到了中南海西花厅，连大人带孩子，熙熙攘攘地把西花厅挤得满满的。春节期间也是周恩来对晚辈进行家风家教的时候，这一次依然如此。他在对周保章的谈话中说：“希望你扎根在基层，永远做普通的劳动者。”这一句教诲和嘱咐，周保章铭记于心，他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默默无闻在基层工作直到退休，退休后仍然发挥余热，积极奉献。时至今日，周恩来的晚辈都牢记他的教导：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这是周恩来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

王羲之的家风

□ 李秀亮

沈约曾对其称赞道：“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世之盛者。”侍中王僧虔曾自诩道：“王家门中，优者则龙凤，劣者犹虎豹。”王氏家风醇厚绵长，尊礼重教，在王羲之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并因其而发扬光大。

淡泊名利 随遇而安

按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的规定，出自名门望族的王羲之，本可以凭借宗族的底荫平步青云，纵横官场，安享荣华富贵。但生性豁达的他，却能够超越世俗的局限，看淡权势，向往山水田园的生活，喜欢在纵情山水之间追求生命个体的超越与自由。早在年轻时，王羲之便能对望族郗氏的登门选婿之举不以为意，不学其他同宗子弟着意整饬，只是随性坦腹而卧于东床之上，没想到却也因此得到郗氏族人的青睐，从而给后世留下了“东床快婿”的佳话。其自由洒脱、率性而为的天性由此可见一斑。

及年长入仕后，王羲之也没有将高官厚禄当成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孜孜不倦地追求，反而更喜欢在从政之余与友人衔杯引满，兴言高咏，在山水之间以文会友。其中最知名的，当属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兰亭之会”。是年的上巳日（阴历三月初三），王羲之在山阴兰亭召集诸东土名流、属官等40余人，曲水流觞，赋诗饮酒，纵情欢乐，并在席间即兴写下千古名篇《兰亭集序》。

公元355年，素与王羲之“不

协”的驸马将军王述升任扬州刺史，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并对其挟私报复。王羲之无奈之下，只好称病辞官。并为此专写誓文一篇，宣读于父母墓前，以示从此彻底脱离仕途。

但赋闲归家的王羲之并未因此自怨自艾、意志消沉，却转而与友人结伴，“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更与道士许迈“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直到去世的前一年，王羲之还打算远游四川，一睹蜀地风物。

这种拿得起、放得下的潇洒，充分说明不为官累、恣意田园一直都是王羲之内心深处的理想追求。而这份不以权力为进退的豁达，也间接成就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和艺术成就。

勤政爱民 廉洁奉公

王羲之生活的东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士大夫普遍谈玄论佛、不思进取。但王羲之自年轻时即深受先辈家风的影响，秉承儒家积极入世、修齐治平的理想，时刻以国家、民生为重。他一面公开批评清谈之士“虚谈废务，浮文妨要”，一面积极关心时政，力匡社稷。

自公元325年至公元355年间，王羲之先后担任秘书郎、临川太守、江州刺史、护军将军、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在从政的30年间，爱国忧民、匡扶救世，在其位、谋其政的理念始终贯穿着他的仕宦生涯。王羲之出任江州临川郡太守后，为造福民众，全力清理积

弊，使当地政务大有起色。在任护军将军后，鉴于兵营中兵员不足、军事装备陈旧、战马瘦弱不堪的现状，王羲之发布《临护军教》，全力予以改变。在任会稽内史时，王羲之还多次上疏朝廷，针砭时弊，救民于水火，有效改善了会稽的社会现状。

总体看来，王羲之为政之时，多次为民请命，力除弊政，敢于得罪当朝权贵，尽职尽责，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对待权力，不角逐、不滥用、不谋一己之私利，却能时时以百姓利益为重。其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为政思想，足可垂范后世子孙。

精益求精 臻于至善

作为“书圣”，王羲之在楷、草、行等书体上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所作的《兰亭集序》，运笔矫健清婉，风骨爽峻，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无论文字内容上，还是书法艺术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但这些成就的取得，与王羲之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琅琊王氏世代精通书法。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擅写隶书和行书，叔父王虞曾是当时成就最高的书画家，号称“江左第一”。在此家学熏陶下，王羲之自幼即研习书法，16岁时，书法和绘画已能看一眼即可临摹，所谓“书画过目便能”。

但王羲之对自己的成绩从不自满，每日坚持临帖练字，以至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据传，王羲之早年

刻苦练字，经常到池中洗刷砚台，以至把池水染成墨色。此外，王羲之在会稽时曾痴迷于鹅，且不惜手书《道德经》与道士换鹅。他通过细心观察鹅的体态姿势，“悟入鹅群行水势”，竟于鹅的姿势情态中悟得书法执笔运势之妙，从而使书技更加精进。

王羲之这种沉迷艺术、追求极致精神，深深影响了后世子孙。史载其幼子王献之五六岁起，便在父亲的影响下研习书法。并在父亲的亲自教导下，苦练书技，10多岁时便已颇有成绩，并最终成为继王羲之之后的又一位书法名家。二人既为父子，又为师徒，“二王”在后世亦成为书法典范的代名词。

勤学崇礼 孝悌立身

对子弟及家庭成员的教育和训诫，一直是琅琊王氏家族一贯重视的传统。王羲之在自己50余年的人生历程中，一方面，恪守先祖遗训，遵奉儒家礼教，勤于治学，精于练字，勉于为政。另一方面，在治学从政的过程中，王羲之还利用各种场合，以儒家礼法教诲子弟，身体力行地影响家人，并劝导子嗣明经守礼，有所作为，恪守并延续

王氏家风。

在屡被后人称道的“兰亭之会”中，参与者除了时贤名流外，王羲之还携带自己的几个儿子前往，共享盛会。在晚年辞官誓慕、赋闲归家后，王羲之更是携带第六子王操之“由无锡徙居金庭。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同时，大力“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之礼。通过这种方式，王羲之向后辈子孙传达了自己“率性旷达”的真性情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态度，从而以言传身教的形式传达自己的优良家风，以期影响和改变后人的处世准则和人生态度。

受王羲之良好家风的影响，其诸子之间感情和睦，谨守孝悌之礼。第五子王徽之和第七子王献之感情深厚。

王羲之利用自己50余年的人生履历所诠释、体悟、传承的家风家训，是魏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济世救民、匡扶社会的儒学情怀，追求天性、恣意山水的玄学理想，以及淡泊名利、不尊权贵的洒脱气质，不仅对当时的王氏后人影响深远，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价值重构工作，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传承中华好家风